

档案所见乾隆时期宫廷里的 苏州玉工传略

Brief Biographies of Jade Craftsmen from Suzhou in the Imperial Workshops of
the Qianlong Period as Recorded in Archives

郭福祥

Guo Fuxiang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 Vol.13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三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档案所见乾隆时期宫廷里的苏州玉工传略*

Brief Biographies of Jade Craftsmen from Suzhou in the Imperial Workshops of the Qianlong Period as Recorded in Archives

郭福祥

Guo Fuxiang

内容提要:

本文将造办处活计档中记载乾隆时期在宫廷服务的苏州玉工的资料按人列传,再稍作分析,以明了每一位苏州玉工是什么时间被召至造办处,薪资情况如何,在造办处都做了什么活计,在宫中服务多长时间,手艺水平如何等等。其中可以考见姓名者多达27位,远远超出以往的研究。将他们在宫廷造办处的活动综合起来考察,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苏州玉工和乾隆宫廷玉器制作高度繁荣间的密切关系。这些玉工不但将精湛成熟的苏州制玉技术带到宫廷,而且还能够充分发挥优势,满足宫廷融合各种技术并有所创新的需求。同时宫廷也为这些玉工施展才艺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使其得以摆脱传统家庭式手工作坊的种种限制,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创作之中。宫廷成为南北玉器制作技术和理念融通交汇的舞台,苏州玉工的北上形成了和宫廷间的良好互动,极大影响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玉器制作,使得元明以来形成的南北玉器精细与粗犷的风格分野变得渐趋一致,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关键词:

乾隆时期 活计档 宫廷 苏州玉工 传略

ABSTRACT:

Based on records in the Q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s employment archives (huoji dang), the article compiles brief biographies for Suzhou jade craftsmen who served the imperial workshops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1732-1795). The names of as many as twenty-seven craftsmen were clearly recorded in the archives, which were untouched in previous studies. A general overview of the service they provided for the Imperial Workshop clearly indicates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se craftsmen and the culmination of jade craftsmanship in the Qianlong court. They not only introduced sophisticated jade-working techniques to the palace but also gave full play of their ingenuity to serve the court's demand for innov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and blending of a variety of techniques and source materials. In the meantime, the court exerted considerable effort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se craftsmen and freed them from restrictions troubling traditional family-based handicraft production. As a result, they were able to fully dedicate themselves to their creative work. The court served as a platform that blended, in terms of both technique and ideology,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styles of jade-working. Their migration from Suzhou to Beijing facilitated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imperial court and provided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the Beijing-centered, northern-style jade-working. The North-South stylistic distinction of jade-working—uninhibitedness of the former versus exquisiteness of the latter—that were witnessed by the Yuan (1271-1368) and the Ming (1368-1644) periods gradually disappeared. Jade craftsmanship entered a brand new era.

KEYWORDS:

Qianlong reign,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s employment archives, imperial court, Suzhou jade craftsmen, brief biographies

* 本文为笔者《乾隆宫廷与苏州玉器》研究的部分成果,受到香港北山堂基金会“利荣森纪念交流计划”的资助,特此感谢。

笔者几年前参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德国马普研究会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宫廷与地方技术交流史》合作项目，以清代乾隆时期玉器制作技术领域为考察对象，就乾隆宫廷与苏州间治玉技术传播和交流的历史进行研究，写成《宫廷与苏州——乾隆宫廷里的苏州玉工》¹一文。文中原来列有《乾隆时期奉职于造办处的苏州玉匠情况》一表，对当时已知服务于清宫造办处的苏州玉匠23人的情况列表介绍。但限于篇幅和论题内容，此表最终被裁除。论文虽然列有《造办处中的苏州玉工》一节，但都是从总体方面着重就造办处苏州玉工的征调和管理、他们在宫廷中就制玉技术传播进行的咨询、培训和创新等方面进行分析，对于每一位玉匠的具体情况则较少涉猎。

在上述研究和收集材料过程中，笔者深感苏州手工技艺与清代宫廷的密切关系，而这一关系建立的基础就是苏州织造的存在。在我看来，乾隆时期玉器雕刻的高度繁盛是历史长河流淌至此天时、地利、人和协调统一的结果，而技艺高超的苏州玉工和联通宫廷与民间的苏州织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关注作为个体服务于北京宫廷的苏州玉工的具体情况。

周南泉先生曾在《明清琢玉、雕刻工艺美术名匠》²一文中胪列了清宫造办处活计档所载17位服务于宫中的南方玉匠的名字，其中8位被周先生考订来自苏州。台北故宫博物院嵇若昕研究员在其《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南匠薪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³一文中，就具有薪资资料的造办处南匠进行了详细梳理，其中来自苏州的玉匠和刻字玉匠达到了13人。但由于论述的角度不同，对造办处里的苏州玉工个人的详细情况并没有集中阐述。

2013年10月笔者受香港北山堂基金会“利荣森纪念交流计划”奖助，赴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为期半年的交流和研究。期间查阅了台北故宫收藏的档案资料，发现了部分苏州玉工的新资料，使乾隆时期可以考见姓名的服务于宫廷的苏州玉工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7位，同时也使笔者获得充分时间对上述资料进行梳理，并最终草成此文。

本文主要目的是将档案中所记载乾隆时期在宫廷服务的27位苏州玉工的资料做一全面整理，按人列传，先把相关的档案原文引出，再稍作分析，以明了每一位苏州玉工是什么时间被召至造办处，薪资情况如何，在造办处都做了什么活计，在宫中服务多长时间，手艺水平如何等等，使苏州玉工和宫廷玉器制作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更具体的认识。

一 苏州玉工之概念

对“苏州玉工”这个概念的理解，笔者过去一直以来都存有一种比较简单直接的想法，即是来自苏州的

1 郭福祥：《宫廷与苏州——乾隆宫廷里的苏州玉工》，载《宫廷与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技术交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169～220页。

2 周南泉：《明清琢玉、雕刻工艺美术名匠》，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第79～87页。

3 嵇若昕：《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南匠薪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载陈捷先等主编：《清史论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9～575页。

玉工。这种理解很大程度上源自乾隆帝的相关叙述。在乾隆帝的御制诗中,经常会有“吴市俗工”¹“苏州玉工”²“吴间玉工”³、“苏州专诸巷玉工”⁴、“吴中玉匠”⁵等提法,使人轻易认定苏州玉工就是苏州城内的玉工,最起码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地范围之内的玉工。这样的理解从总的情形而言可能并无大碍,但一旦涉及每一位玉工的具体细节,上述想法可能就会出现一定的偏差,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一方面,宫廷内的苏州玉工属于内务府匠役中的“南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其南匠由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衙门行取,所食钱粮亦动用造办处库银给发”⁶。由于记载过于简略,很难对这两个衙门拣选、行取南匠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而且这一记载与招募南匠的实际情况也不甚相符。实际上在乾隆时期,由于各地工艺技术的地区性差异和内务府派出机构的职责范围不同,负责为宫廷拣选工匠的机构并不仅仅限于粤海关和苏州织造,其他如两淮盐政、九江关等也承担选送好手匠人赴京应艺之任务⁷。但就乾隆时期服务于宫廷的南玉匠而言,基本上都是由苏州织造负责向宫廷输送的。顾名思义,苏州玉工即是由苏州织造选送到宫廷的制玉工匠。

另一方面,这些通过苏州织造拣选送京的南玉匠的籍贯范围非常之广泛,并不仅仅限于苏吴一区,如乾隆四十四年通过苏州织造征调的琢玉匠平七即为嘉兴人,而非苏州人。但他的弟弟平八却在苏州开有玉器店,专门制作玉器经营玉器生意,与苏州玉器市场关系密切⁸。可以这么说,这些玉工都是以苏州作为自己玉器雕刻发展的平台,受到苏州技艺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使自己的高超技艺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并为社会所认同。他们不一定是苏州籍贯,但一定是在苏州这个地方达到自己玉器制作技艺的高点。因此用“苏派玉工”或“苏帮玉工”来概括这些玉工的属性可能更为妥帖。

因此本文所讲的宫廷中的苏州玉工即是指那些在苏州制作玉器,与苏州玉器市场关系密切,并通过苏州织造拣选赴宫中造办处应艺的好手玉匠。

二 乾隆时期造办处苏州玉工传略

乾隆初年造办处的南玉匠基本上还是雍正时期招募进来的,雍正时期见于记载的造办处南玉匠有陈宜嘉、王斌、鲍有信⁹、都志通、姚宗仁、韩士良¹⁰等。到乾隆即位时,这些南玉匠应该还都继续留在造办处制作玉器,

1 弘历:《御制诗五集》卷二八《咏和闾玉璧》。

2 弘历:《御制诗五集》卷八〇《题和闾玉仿文王鼎》。

3 弘历:《御制诗五集》卷九〇《题和闾玉石室藏书图》。

4 弘历:《御制诗五集》卷九六《咏和闾玉刻蓬壶仙侣图》。

5 弘历:《御制诗余集》卷九《题和闾玉如意》。

6 (清)托津等奉敕纂: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一七《内务府·造办处职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

7 郭福祥:《宫廷与苏州——乾隆宫廷里的苏州玉工》。

8 郭福祥:《平七与琢玉技术在宫廷的传播》,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3期。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以下简称《总汇》),共55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册,第650页,雍正五年十一月《记事录》:“二十五日郎中海望启称怡亲王,查得造办处南方玉匠陈廷秀、许国正、杨玉病故,施仁正已回南去。今造办处做玉器南匠甚少,现有玉匠陈宜嘉、王斌、鲍有信等三名,今欲召募伊等顶替陈廷秀等四人在造办处当差,其所食工食亦照南匠例给等语。奉王谕:准伊等顶替在造办处当差。”

10 《总汇》第4册,第198页,雍正七年十月《记事录》:“初三日怡亲王府总管太监张瑞交来年希尧处送来匠人折一件,内开:……玉匠都志通、姚宗仁、韩士良等三名……共十六名,随籍贯折一件,食用银两折一件,……传怡亲王谕:着交造办处行走试看。”

其中的陈宜嘉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还在造办处如意馆当差¹。而苏州玉匠姚宗仁经过几年的磨炼，乾隆时已经成为造办处非常重要的玉器设计者，与乾隆帝的关系非常密切。²乾隆三年内大臣海望关于挑补造办处匠役的奏折中，开列了造办处内准备增加的各种南匠的数量，当时并没有开列玉匠数量，³说明此时造办处的玉匠尚可应付玉器活计制作的需求。根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从乾隆十二年（1747）开始又陆续从苏州征调玉工到造办处服务，见于记载的在乾隆一朝共有18批次近40人，而实际征调的批次和人数肯定比这还要多，是相当可观的。⁴其中能够考见姓名者多达27人，现依据造办处活计档对这些苏州玉工的具体情况整理如下。

1. 姚宗仁

乾隆早期清宫造办处玉匠的代表人物。雍正七年（1729）由江西督陶官年希尧选送进京，但一般认为他是苏州人，见杨伯达《关于乾隆帝弘历古玉辨伪的研究》。⁵关于姚宗仁的籍贯，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录，年希尧选送他进京时，本来附有各匠籍贯的折子，但迄今未见。结合当时选送他的年希尧为淮安关监督兼九江陶务，而淮安关隶属于江苏巡抚管理，与苏州关系更为密切的情况，推测姚宗仁为苏州人的可能性很大。

在乾隆初年至二十年间乾隆帝经常指名由他设计玉器，并“常以艺事咨之”⁶，故待遇很高，乾隆六年（1741）冬秋季《发用银档》记载姚宗仁每月钱粮银多达十三两⁷，是最高等级的钱粮记录。几年以后的乾隆十年（1745）二月二十一日，乾隆传旨让海望将春雨舒和画画人并姚文汉同画大阅图人、如意馆人每月所食钱粮及两季衣服银两若干，俱各查明回奏，两天后乾隆帝收到相关折片，传谕“将姚宗仁钱粮裁减五两，添给衣服银二十四两”⁸。即使这样，姚宗仁的钱粮每月仍然有八两之多，还是相当高的。

姚宗仁在玉器方面的知识和技术非常全面，既能鉴定，又能设计，还能够雕刻，像这样集多种技能于一身的玉工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因此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乾隆早期造办处玉器制作方面的代表人物。

他是乾隆早期宫廷玉器最重要的设计者。张丽端在其《从活计档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制器用的两个机制》中表列了自乾隆六年（1741）至十八年（1753）间姚宗仁二十七项画样设计玉器的记录，这些记录表明他设计的玉器题材多样，除清宫通常使用的吉祥母题外，多为文人雅士故事，与乾隆帝的文人气质十分契合，深得天心。⁹根据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正月二十七日姚宗仁将白玉带照天字一号白玉阳文斧佩样画得洪字七号斧佩样一件、照黄字四号汉甘黄玉阴文斧佩样画得荒字八号斧佩样一件、照宙字六号汉玉阴文斧佩样画得日字九号斧佩样一件，郎正培、瑞保呈览，奉旨：准照样刻做，钦此。”¹⁰其中“洪字七号”白玉斧佩和“荒字八号”白玉斧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同贮于一商银丝紫檀木盒中，可以使我们对姚宗仁的设计作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1 《总汇》第21册第761页，乾隆二十一年正月行文：“查现在如意馆行走玉匠陈宜嘉等每月食钱粮银四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

2 张丽端：《从活计档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制器用的两个机制》，《故宫学术季刊》24卷第1期第45～70页。

3 《总汇》第8册第255～256页，乾隆三年七月《记事录》。参见前揭郭福祥：《宫廷与苏州——乾隆宫廷里的苏州玉工》。

4 参见郭福祥：《宫廷与苏州——乾隆宫廷里的苏州玉工》。

5 杨伯达：《关于乾隆帝弘历古玉辨伪的研究》。载《杨伯达论玉》，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399～407页。

6 弘历：《御制文初集》卷五，“玉杯记”。

7 《总汇》第10册，403页，乾隆六年“各作为领南匠钱粮并衣服银”。

8 《总汇》第13册，第530页，乾隆十年二月《记事录》。

9 张丽端：《从活计档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制器用的两个机制》，《故宫学术季刊》，24卷第1期。

10 《总汇》第17册，第351页，乾隆十五年二月《如意馆》。

他鉴古经验丰富，乾隆帝在其所著《玉杯记》的文章中曾详细记述了他和姚宗仁之间就玉器染色做旧方法所进行的讨论，此次讨论对乾隆皇帝后来染色玉器的鉴定实践至关重要，一直到乾隆晚年，他对古代染色玉器的判断主要还是依据姚宗仁向他提供的知识和经验。每当乾隆皇帝据此方法鉴定出一件玉器，他都要命相关匠作制匣盛装，并在匣外壁刻《玉杯记》全文，这样的器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中都有收藏。

姚宗仁在清宫造办处服务近三十年，经其手制作的玉器当不在少数，有于除画作外不经钦定内廷工匠不得在作品上签署名款的惯例，要在现存诸多宫廷玉器中确定姚宗仁的作品实属不易。综合各方面的材料，香港苏富比于2003年4月27日举行了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乾隆遗珍》专场拍卖中的“三希堂《快雪时晴帖》白玉插屏”中的“羲之爱鹅”雕刻极有可能出自姚宗仁之手，详细考证见笔者《清宫收藏中所见苏州玉工制作玉器实例考证》一文。

2. 朱彩

档案中有时亦作“朱采”。乾隆早期造办处著名的刻字玉工。嵇若昕认为由苏州织造选送入京，甚确¹。乾隆十七年（1752）五月初一日，员外郎郎正培等将朱彩回籍带活计往返路上刻做，请旨：著苏州织造安宁有便船接送往来，奏闻，奉旨：知道了，钦此。于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员外郎白世秀将苏州织造安宁送到朱彩回籍带活计路上刻做，今刻得官窑瓷臂搁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²朱彩回籍探亲由苏州织造负责用船接送往来，可知他是由苏州织造选送的苏州玉工。

朱彩具体来京年份不详，乾隆六年（1741）六月初一日，为画院处画画人叶礼风业经革退，画样人汪汉回南，现有伊住官房二处，意欲将二处官房祈王大人赏给画样人卢鉴、刻字人朱彩居住等语，回明监察御史沈喻、郎中色勒、内大臣海，启怡亲王，准行赏给，遵此。”³可知朱彩乾隆六年即已供职造办处，并拨给官房居住。享受每月四两钱粮银，每年春秋二季十五两衣服银的待遇⁴。

在乾隆八年（1743）至二十二年（1757）的造办处活计档中有大量朱彩制作活计的记录，是目前所知的在宫中制作玉器活计记录最多的苏州玉工之一。其制作的活计情况见表一。

表1 活计档记录的朱彩宫中成做玉器活计情况

编号	时间	活计内容	出处	备注
1	乾隆八年五月二十日	太监高玉、胡世杰交御题张若霭诗四张，树皮方笔筒一件，随紫檀木座。传旨：将此诗着朱彩进如意馆刻在笔筒四面，钦此。于本月二十日交刻字匠朱彩持去讫。	《总汇》第11册第355页，乾隆八年五月《刻字作》。	
2	乾隆八年八月初四日	朱彩将为刻玉《九符》二十四片所剩余得金刚钻三厘九毛交回，四达子、穆登额收。	《总汇》第12册第129页，乾隆八年六月《暂领档》。	
3	乾隆八年八月初四日	刻字作刻青玉《九符》十一片，用金刚钻九分八厘五毛。八月初四日朱彩领行取金刚钻九分八厘五毛，四达子、穆登额发。	《总汇》第12册第129页，乾隆八年六月《暂领档》。	

¹ 嵇若昕：《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南匠薪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载陈捷先等主编：《清史论集》（上），第519～5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² 《总汇》第18册，第687页，乾隆十七年五月《记事录》。
³ 《总汇》第10册，第301页，乾隆六年六月《记事录》。
⁴ 《总汇》第15册，第97页，乾隆十二年十二月《苏州》。

续表1

编号	时间	活计内容	出处	备注
4	乾隆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太监张明持来青玉爵盘一分、汉玉爵一支,传旨:将青玉爵盘上锦地着照汉玉爵锦地一样做法着刻字匠役朱彩进启祥宫刻做,钦此。	《总汇》第11册第388页,乾隆八年十二月《如意馆》。	
5	乾隆九年四月初三日	太监高玉传旨:要玉《九符经》呈览,钦此。于本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刻得玉《九符经》一套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奉旨:准刻“小臣朱彩”,钦此。	《总汇》第8册第471页,乾隆三年正月《玉作》。	准许朱彩在其所作活计上署款。
6	乾隆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太监胡世杰交白玉龙耳杯一对,传旨:将无款的杯着交朱彩刻款,钦此。	《总汇》第13册第465页,乾隆十年四月《刻字作》。	
7	乾隆十年七月初一日	太监胡世杰交汉甘黄玉图章二方,传旨:一方刻“乾隆宸翰”,一方刻“惟精惟一”,字样准时着朱彩刻,钦此。	《总汇》第13册第466页,乾隆十年四月《刻字作》。	
8	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三日	太监胡世杰持来御制《玉瓮歌》字本文一张,传旨:着朱彩照《玉瓮》字本文刻在玉瓮内底上面,钦此。	《总汇》第14册第420页,乾隆十一年四月《如意馆》。	
9	乾隆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懋勤殿首领郑爱贵持来白玉宝一方,传旨:交司库郎正培著向造办处传玉匠一名,进启祥宫将旧字磨去,著朱彩照本文刻上,钦此。	《总汇》第14册第368页,乾隆十一年二月《记事录》。	
10	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白玉别子二对,传旨:着朱彩刻字,钦此。	《总汇》第14册第561页,乾隆十一年五月《刻字作》。	
11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	将青玉宝一方磨平,汉玉宝二方字清理端正,交朱彩持去讫。	《总汇》第14册第420页,乾隆十一年四月《如意馆》。	
12	乾隆十二年四月十二日	太监胡世杰交汉玉大素璧一件,紫檀木座有透柳。传旨:交朱彩将玉瓮放下,先刻此璧。其座子交武英殿刻字。钦此。于九月初三日朱彩将刻得字汉玉大璧一件随紫檀木座交首领李金持去陈设讫。	《总汇》第15册第250页,乾隆十二年四月《刻字作》。	
13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	首领文旦交白玉宝一方,随御制诗四面,传旨:宝上着朱彩四面照本文刻上。钦此。于本月二十六日司库郎正培将朱彩刻得字白玉宝一方持进交讫。首领文旦交白玉“敬天勤民”宝一方,传旨:宝上着朱彩四面照样刻字,钦此。	《总汇》第15册第247页,乾隆十二年十二月《木作》。 《总汇》第16册第584页,乾隆十四年二月《如意馆》。	
14	乾隆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太监胡世杰交汉玉刀一件,传旨:着朱彩照样刻字,钦此。	《总汇》第16册第584页,乾隆十四年二月《如意馆》。	
15	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太监胡世杰交:汉甘黄玉合卺爵一件,传旨:着按爵上阳纹花样做一木样,其雷纹地空着,呈览,准时交南边成做,俟做得送来时交朱彩刻雷纹,钦此。	《总汇》第16册第185页,乾隆十三年六月《苏州》。	
16	乾隆十四年正月初六日	太监胡世杰交汉玉汉文夔凤圆图章一方,传旨:着发往南边照文刻做,钦此。于本月十七日太监胡世杰传旨:此图章不必发往南边,着交朱彩照本文刻做。于本月二十九日将图章一方刻得款呈进讫。	《总汇》第16册第735页,乾隆十四年正月《玉作》。	
17	乾隆十四年正月初六日	首领文旦交汉玉大半璧一件,传旨:着朱彩照样刻字,钦此。	《总汇》第16册第584页,乾隆十四年二月《如意馆》。	
18	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七日	太监胡世杰交白玉合卺爵一件、白玉螭虎镶嵌一件、白玉螭虎一件,传旨:白玉合卺爵交朱彩刻款,其螭虎二件作镶嵌用,钦此。	《总汇》第17册第151页,乾隆十四年二月《刻字作》。	
19	乾隆十四年四月初十日	太监胡世杰交:白玉彝炉一件,随铭一张,传旨:着朱彩照样将铭刻在玉炉内底中间,钦此。于八月初十日将刻得白玉彝炉一件呈进讫。	《总汇》第16册第591页,乾隆十四年七月《如意馆》。	
20	乾隆十四年四月三十日	太监胡世杰交汉玉秋蝉一件,随篆字诗一首,传旨:着朱彩将篆字诗在蝉腹上照样刻做,钦此。于八月十七日将秋蝉一件刻得诗呈进讫。	《总汇》第16册第591页,乾隆十四年七月《如意馆》。	
21	乾隆十四年六月初四日	太监胡世杰交白玉六小片,随番字满身番花,传旨:着朱彩照样刻做,钦此。于八月十一日将白玉六片刻得呈进讫。	《总汇》第16册第591页,乾隆十四年七月《如意馆》。	
22	乾隆十四年十月初六日	首领文旦交御笔小楷书二张、宝三方二张、方汉玉一块,传旨:着朱彩照字宝花样按方向刻在方汉玉上,钦此。	《总汇》第17册第346页,乾隆十五年正月《如意馆》。	

续表1

编号	时间	活计内容	出处	备注
23	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一日	太监胡世杰交白玉杯一件，传旨：杯口上下着张廷彦画样呈览，钦此。于本日张廷彦画得杯口上下回纹如意纸样，太监王子云持去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朱彩照样刻做诗堂，亦刻字，底刻“乾隆御玩”款，钦此。	《总汇》第17册第313页，乾隆十五年八月《苏州》。	
24	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一日	太监胡世杰交白玉十方双耳杯一件，随字样宝一方、字三十二个、紫檀木长方托盘随纸样款样，传旨：白玉十方双耳杯上字着朱彩照样刻做。紫檀杯托照样商丝款做银片字，钦此。	《总汇》第18册第362页，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如意馆》。	
25	乾隆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太监胡世杰交汉玉无字圆图章一方，随“乾隆鉴赏”字一张、锦匣一件……，图章上字着朱彩照样刻做，钦此。	《总汇》第18册第334页，乾隆十六年正月《如意馆》。	
26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	太监胡世杰交青汉玉鸂鶒一件，鸂鶒内“德辉云日”字样一张，紫檀座一件，传旨：……汉玉鸂鶒内着朱彩照样刻做……，钦此。	《总汇》第18册第334页，乾隆十六年正月《如意馆》。	
27	乾隆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太监胡世杰交白玉《九符》一套，计十二页，传旨：其玉片字样俱各添金，末页着朱彩刻“小臣朱彩奉敕恭镌”之款，钦此。于本日将白玉《九符》末页上写得朱彩之款，员外郎郎正培等呈览，奉旨：照样准刻，钦此。	《总汇》第18册第343-344页，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如意馆》。	准许朱彩在其所作活计上署款。
28	乾隆十七年五月十五日	太监胡世杰交官窑臂格一件，传旨：着朱彩照样刻得再去，钦此。于本月二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几时有船几时就起身，将臂格带去路上刻做，钦此。	《总汇》第18册第600页，乾隆十七年五月《如意馆》。	
29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太监胡世杰交碧玉有盖瓶一件，粘年款本文计七字；甘黄玉如意一柄，粘诗本文计六十二字，宝二方计四字，传旨：碧玉有盖瓶一件着照本文刻做，其甘黄玉如意一柄，着朱彩照本文刻做，钦此。	《总汇》第22册第532页，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如意馆》。	
30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太监胡世杰交白玉班指一件、碧玉班指一件，传旨：将碧玉班指回文地磨去，着朱彩照白玉班指地斗文一样刻做，钦此。	《总汇》第22册第543页，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如意馆》。	
31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	太监胡世杰交：白玉穿心盒一件、汉甘黄玉赤刀一件、汉白玉石子一件，传旨：将白玉穿心盒上花纹着朱彩改刻，汉甘黄玉赤刀随旧花纹添刻。	《总汇》第22册第547页，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如意馆》。	

从上表可知，自乾隆六年朱彩见于造办处活计档，直到乾隆十年的这几年中，朱彩的主要工作似乎是在刻字作刻制乾隆帝御制的《九符颂》玉册。该御制文文字量很大，而且朱彩还刻制了不止一套《九符颂》玉册。可能朱彩所刻活计令乾隆帝非常满意，因此在乾隆九年和十六年两次允许他在所刻的《九符颂》玉册末页署上“小臣朱彩”和“小臣朱彩奉敕恭镌”的落款，这在乾隆时期的宫廷玉器制作中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朱彩在造办处还刻制乾隆皇帝的御用玺印，表中第7条、第9条、第11条、第16条和第25条档案记载的都是刻制御用宝玺的印面文字，其中汉甘黄玉“乾隆宸翰”玺、汉甘黄玉“惟精惟一”玺、汉玉“乾隆鉴赏”圆玺在《乾隆宝薮》中都有明确的著录。而第13条档案记录的白玉“敬天勤民”宝虽然宝和印文本身制作于雍正元年（1723）¹，但其印体四周的乾隆《敬天勤民宝四言诗有序》御题文字的刻制却出自朱彩之手，刻制的具体时间是在乾隆十二年十一月。

由于朱彩的刻字人身份，其制作活计最多的情况是刻制玉器上的款识和御制诗文字。仅表中档案记录的就包括：白玉龙耳杯上的年款、古玉瓮内的乾隆帝《玉瓮歌》御制诗、白玉别子上的名款、汉玉大素璧上的御制诗、汉玉刀上的名款、汉玉大半璧上的御制诗、白玉合卺爵上的年款、白玉彝炉上的铭文、汉玉秋蝉腹

1 郭福祥：《清代皇帝的三方“敬天勤民”玺》，《紫禁城》，1998年第1期。

部的御制诗、白玉册页上的番字番花、方汉玉上的御笔楷书字、白玉杯上的御制诗及“乾隆御玩”款、白玉十方双耳杯上的御制诗、青汉玉鸠盖内的铭文、碧玉有盖瓶上的年款、甘黄玉如意上的御制诗等，形态多样。偶尔他也承接刻制其他材质器物上的文字，包括表中记录的木质笔筒、官窑臂格上的乾隆御体诗等。朱彩是我们所见留下作品最多的苏州玉工。

此外，朱彩还利用刻字的技巧雕刻一些精细器物上繁复细密的锦地纹、雷纹、番花纹、回纹等细花纹。现有资料表明，朱彩大约从乾隆六年开始被征调到宫廷，直到乾隆二十二年仍在造办处从事活计制作，为宫廷服务至少16年之久。期间曾有一段短暂时间回籍探亲，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他回乡休假，乾隆帝还是让他带上一件官窑臂格在路上刻做，并指示苏州织造安宁用便船接送其往来¹。可见他的手艺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认可。

通过朱彩之手完成的作品现在仍可以在博物馆收藏中看到，详细情况亦可参阅笔者《清宫收藏中所见苏州玉工制作玉器实例考证》一文中的相关部分。

3. 金振寰

又作“金振寰”，刻字匠。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由苏州织造送赴来京，关于其赴京应艺的细节，档案中有详细记述：“十二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着怡亲王、海望传与安宁、图拉玉别子上字刻的甚好，将刻玉别子的刻字匠之内选好手的急速送二名来，钦此。于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和硕怡亲王臣弘等谨奏：为奏闻事：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旨：传与安宁、图拉玉别子上字刻的甚好，将刻玉别子的刻字匠之内选好手的急速送二名来，钦此。钦遵等因行文在案。今据苏州来文内称：遵奉谕旨，选得好手刻玉别子刻字匠金振寰、顾颢光二名送赴来京应役。查刻字匠朱彩每月食钱粮银四两，每年春秋二季衣服银十五两，请照朱彩之例刻字匠金振寰、顾颢光每人每月拟给钱粮银四两，每人每年春秋二季衣服银十五两，缮写折片一件，司库白世秀、催总达子持进交太监胡世杰转奏，奉旨：朱彩在此当差数年，才每月食钱粮银四两，新来的刻字匠着每月给钱粮银三两，其衣服银准给。钦此。”²经过奏请乾隆批准，并参考朱彩的月食钱粮数目，定每月食钱粮银三两，每年春秋二季衣服银十五两。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告假回南，但半年多没有消息，故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一日传谕：“刻字人金振寰告假日久，或身病、或养亲、或有事不得来时，图拉处另要刻字一人前来，钦此。”³一个月以后的六月五日，金振寰回到北京。相关人员奏请乾隆帝后，命“着在如意馆行走”⁴。

乾隆“十五年八月初六日，太监胡世杰交白玉羽觞洗一件，传旨：着姚宗仁将洗口上下、两耳俱画刻阴道细花纹呈览，钦此。于本月十一日将洗口上下、两耳画得刻阴道细花样，太监卢成持去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阴道细花纹并宝、字俱照样准刻做，钦此。于十八年六月二十日，金振寰刻得羽觞上周身花纹、堂子内诗、底下大宝二方。”⁵该白玉羽觞洗是金振寰在造办处刻做活计的唯一记录，说明至少到乾隆十八年他仍

1 《总汇》第18册，第687页，乾隆十七年五月《记事录》。

2 《总汇》第15册，第97页，乾隆十二年十二月《苏州》。

3 《总汇》第18册，第378页，乾隆十六年闰五月《记事录》。

4 《总汇》第18册，第345页，乾隆十六年六月《如意馆》。

5 《总汇》第20册，第380～381页，乾隆十九年八月《如意馆》。

然在造办处应艺。

4. 顾觀光

刻字匠。从前引乾隆十二年（1747）档案可知他是和金振寰一起于乾隆十三年四月由苏州织造选送来京的“好手刻玉别子刻字匠”。每月给钱粮银三两，每年春秋二季衣服银十五两。乾隆二十一年正月传旨：“着安宁选好手刻字匠一名、玉匠一名送来应差。”为了拟定新来玉匠的薪资，造办处相关人员“查现在如意馆行走玉匠陈宜嘉等每月食钱粮银四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刻字匠顾觀光等每月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¹作为依据。说明乾隆二十一年顾觀光仍作为刻字匠在如意馆行走，所食钱粮银和衣服银一直没有变动。其制作活计情况未见档案记录。

5. 鲍德文

玉匠。乾隆十九年（1754）进入造办处行走。“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员外郎郎正培奏称：玉匠鲍德文每月钱粮并衣服银两，请旨。玉匠鲍德文每月钱粮衣服银照陈宜嘉、邹景德钱粮一样赏给，钦此。”²说明此时鲍德文刚刚到京，需要依照原来的玉匠薪资拟定其待遇，而当时玉匠陈宜嘉的钱粮是每月钱粮银四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鲍德文在造办处一直工作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这一年五月他告假回籍葬父养母，其缺仍令苏州织造另选好手玉匠一名送京填补。³按照当时造办处选取南匠的惯例，一旦南匠缺出，一般由原选送织造或关监按原工种选取新匠顶补应役，说明鲍德文是由苏州织造选送来京的玉匠。鲍德文在宫廷服务近八年时间。

鲍德文回到苏州后，并没有淡出宫廷玉器制作。两年以后，他又再一次出现在苏州织造普福的奏折中：“遵旨查得，玉匠鲍德文系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京由造办处奏明，告假回苏葬父养母。伊母今年八十三岁。鲍德文现在织造衙门办理青玉特磬事件。再查，玉磬原交八十一件，除于本年三月十三日恭缴过减半特磬十二件，现在奉到玉料，成做大特磬五十六件，内琢成做细者十四件，锯坯琢做者四十二件，尚有未到玉料十三件，谨此奏闻。”⁴表明鲍德文回到苏州后，仍然受雇在苏州织造衙门内制作玉器，专门办理苏州织造承接的玉磬制作任务。

造办处活计档中有两条档案记录了鲍德文在造办处成做活计的情况。一是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得催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为本月十三日太监胡世杰交黄玉斧珮一件，传旨：将黄玉斧珮上下花纹照大黄玉斧珮上花纹改画呈览，其边线不必动，钦此。于本日催总德魁将黄玉斧珮上二面改画花纹，面奉呈览，奉旨：照样准做。俟鲍德文将白玉大盘做得时，接做黄玉斧珮，钦此。于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员外郎郎正培将做得黄玉斧珮一件呈进讫。”⁵二是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接得员外郎金辉押帖一件，内开本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启祥宫将收贮玉内挑一块画观泉图山子一件，背后刻诗，钦此。于本日随画得观

¹ 《总汇》第21册，第761页，乾隆二十一年正月《行文》。

² 《总汇》第20册，第388页，乾隆十九年十月《如意馆》。

³ 《总汇》第27册，第364页，乾隆二十七年五月《记事录》：“郎中白世秀、员外郎寅著将玉匠鲍德文告假回籍葬父养母，仍着该织造选好手玉匠一名送京应役一折，持进交太监胡世杰转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⁴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普福《奏报苏州沿途所见米粮钱价及麦苗雨水情形折》，《宫中档奏折》，403017721号，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四日。

⁵ 《总汇》第21册，第320页，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如意馆》。

泉图样呈览，奉旨：着鲍德文做，钦此。”¹其制作的玉器包括黄玉斧珮、白玉大盘、玉观泉图山子以及在苏州织造内制作的玉磬等。

6. 倪秉南

亦作“倪炳南”，玉匠。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由苏州织造选送来京。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员外郎白世秀、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着安宁选好手刻字匠一名、玉匠一名送来应差，钦此。于五月初七日和硕果亲王臣等谨奏，为奏闻事：今苏州织造安宁遵旨送到玉匠倪秉南一名、刻字匠周云章一名，查现在如意馆行走玉匠陈宜嘉等每月食钱粮银四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刻字匠顾觐光等每月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今新到之匠手艺拙巧尚未试看，今暂各拟给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可否如数赏给之处，伏候谕旨遵行，谨此奏闻。于本日员外郎白世秀、金辉将折片一件持进交首领张玉、太监胡世杰转奏，奉旨：玉匠、刻字匠着在如意馆行走，其所食钱粮衣服银两知道了，钦此。”²因此确定其每月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在如意馆行走。

倪秉南在造办处服务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多得时间。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因其父病故，乞假回籍葬父养终，为此造办处特别奏请乾隆旨意。“二十九日，造办处谨奏为请旨事：据玉匠倪炳南呈称，伊父于本年七月十二日物故，孀母年已七十，家内无人，乞假回籍葬父养终，俟终养之日仍即来京应役等因，具呈。查从前画珪琅人胡信侯告退终养，曾经奏请准其终养在案，今倪炳南告假葬父并请终养，但伊手内现做碧玉班指做至九成，俟得时照伊所呈，准其终养。再查内廷现有玉匠四名，此缺可否令该织造另选玉匠一名，顶补当差之处，伏候谕旨遵行，为此奏请旨，于本日具奏，奉旨：知道了，玉匠准要，钦此。”³

以上是仅有的记载苏州玉匠倪秉南在北京宫廷服务情况的档案，从中可知倪秉南家庭的具体情况。他到宫廷服务时，双亲已经年过七十，只有一子，无人服侍于膝前，凄苦可知。而且当得知父亲病故，乞请回籍葬父养终时，他正在制作碧玉班（扳）指，已经做至九成，造办处官员还是令其做得时再回籍，显示出当时供奉宫廷的匠作艺人在服侍君主与为子孝亲之间的两难境地。档案中提到终养之日仍即来京应役，但我们没有发现他再回北京服务的记录。

7. 周云章

刻字匠。他和倪秉南一起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由苏州织造选送来京。从前面引述的档案知其最初每月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并安排在如意馆行走。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接得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来帖一件，内开：本月初七日太监胡世杰交：白玉穿心盒一件、汉甘黄玉赤刀一件、汉白玉石子一件，传旨：将白玉穿心盒上花纹着朱彩改刻，汉甘黄玉赤刀随旧花纹添刻。其白玉石子画细花纹，着周云章刻做，赶外出要得，钦此。”⁴乾隆点名让周云章刻白玉石子上的细花纹，也同样是出于刻字匠对玉石雕刻及线条掌控力较强的考量。

1 《总汇》第25册，第534页，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如意馆》。

2 《总汇》第21册，第761页，乾隆二十一年正月《行文》。

3 《总汇》第22册，第795页，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杂录》。

4 《总汇》第22册，第547页，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如意馆》。

8. 张象贤

玉匠。乾隆二十三年（1758）九月由苏州织造安宁奉旨选送至造办处。关于张象贤的资料，档案中只有一份他刚刚到北京时造办处按例申奏发给钱粮的记录：“二十八日，造办处谨奏为请旨事：今据苏州织造安宁遵旨送到玉匠张象贤一名，查乾隆二十一年五月间该织造送到玉匠倪秉南，曾经奏请给食每月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在案。今新送到玉匠张象贤可否照倪秉南之例如数赏给之处，伏候谕旨遵行。缮写折片一件，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持进交总管张玉、太监胡世杰谨奏，奉旨：着照例赏给。钦此。”¹ 知其每月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

9. 徐明彩

玉匠。由苏州织造选送至宫廷服务，具体进京时间不详。

关于徐明彩的情况，活计档中没有相关记录，但在上谕档和宫中档奏折中则有所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七月初九日其母身故，两个月以后徐明彩才得到消息，向造办处请假回籍葬母。造办处为此奏明乾隆帝，有感于众多南匠告假纷纷，乾隆帝于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针对南匠告假问题发布了如下上谕：“造办处工匠向令苏州织造及粤海关监督等挑选送京。乃该工匠等往往到京未久，辄行藉词告假，及予假之后，迟延时日，不即赴工。现在苏州玉匠徐明彩因母丧呈请回籍，经造办处奏请，行文本籍，俟查明后再行给假办理，未尝不是。但该处行文，往返未免迟缓。著传谕萨哈岱，即将该匠是否母丧属实，速行查明具覆。再苏州、广东工匠甚多，此后挑选时，应择其手艺精工而无家累牵制者送京，何必以亲老不能久离者充数？亦可省将来告假纷纷，稽查往返之烦。著将此一并传谕方体裕知之。钦此。”² 该上谕由总管内务府大臣遵旨传谕苏州织造萨哈岱、粤海关监督方体裕。

苏州织造萨哈岱于十月三十日接到该上谕，即对徐明彩所述说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于十一月初三日向乾隆帝折奏：“奴才当即飞檄吴县知县介玉涛速行确查去后。兹据该县查明，徐明彩之母朱氏委于今年七月初九日身故，传问伊父徐在名，并地邻人等，众口金同，情愿出具甘结，并加具该县印结，申送前来。奴才复密询现今在署做活之玉工，亦云徐明彩母丧属实，委无捏饰情弊。除将印甘各结存案外，所有奴才查明缘由，合行奏覆。”³ 经过问询家人、邻居、同行等，证实徐明彩母丧属实。在母亲去世四个月之后，徐明彩告假获得批准，回籍葬亲。从乾隆帝的上谕可以得知乾隆帝之所以对苏州玉匠徐明彩请假回籍葬亲如此关注，可能这件事本身在当时具有典型性，其中最主要的是牵涉到对造办处南匠的管理问题。但不管怎样，这一偶然发生的事件却为我们保留了一位苏州玉工的情况，不致使其淹没不闻。

10. 张君选

玉匠。他是乾隆中期档案记录较多的一位苏州玉工。

二十六年（1761）正月“二十八日，接得员外郎安泰、金辉押帖一件内开，本月二十七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传与苏州织造安宁挑拣好手玉匠一名送来，钦此。于五月二十五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寅著口苏州送到玉

¹ 《总汇》第23册，第590页，乾隆二十三年九月《记事录》。

²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四册第316页，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

³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萨哈岱《谨奏为查明徐明彩母丧告假并奏覆事折》，《宫中档奏折》，403016221号，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

匠张君选一名，拟得每月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折片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转奏，奉旨：知道了，钦此。”¹

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接得员外郎安泰、德魁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十六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将金辉送到玉石子内汉白玉画样呈览，钦此。于十七日将汉白玉石子一块画得东方朔献寿陈设一件，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著张君选接做，钦此。”²

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郎中白世秀为……，玉匠张君选告假葬亲，请照例给假六个月回籍假满令伊作速来京应役缮折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转奏，奉旨：知道了，钦此。”³

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接得员外郎安泰等押帖一件内开，本月二十二日太监胡世杰交旨：玉匠张君选现做白玉蟠夔洗迟滞不合样款，将所食每月钱粮减去一两，钦此。”⁴

四十年闰十月“十五日，库掌五德、福庆来说副都统金传旨：蔡天培、张君选在造办处现无有成做活计，向启祥宫要玉器二件交出着伊等成做，钦此。于本日交出白玉异兽一件，上画东升墨道、青玉石子一件，上画虎头彝墨道，传旨：交蔡天培、张君选照样成做，钦此。于十一月十六日将张君选做得白玉东升一件，随扎下回残玉一块持进呈览，奉旨：东升留下，其玉回残做材料用，钦此。”⁵

四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皮糙玉石子一件，上画鹅墨道；青玉回残一块，上画桃式水盛墨道；青玉回残二片，上各画鸡心珏墨道，俱系如意馆查来，传旨：着交张君选、蔡天培分做，钦此。”⁶

四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福庆来说，太监如意交：皮糙玉石子一件，上画双鹿墨道；皮糙玉石子一件，上画双狮墨道，传旨：着张君选照样成做，钦此。于七月二十三日员外郎四德、五德将张君选现做未完皮糙玉双鹿一件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着如意馆改做，其玉双狮交张君选照墨道成做，钦此。于八月二十日员外郎四德、五德将张君选现做玉双狮一件因有石性，改画得山石陈设样随画纸样一张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交如意馆另挑玉一块画样，着张君选做，钦此。于八月二十五日员外郎四德、五德来说太监如意交白玉双鹿一件，系如意馆画得改做墨道，传旨交张君选成做，钦此。于十一月初一日员外郎四德、五德将张君选做得白玉双鹿一件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着光好呈览，钦此。”⁷

从以上档案可知，张君选于乾隆二十六年五月由苏州织造选送来京，给每月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乾隆二十七年七月给假六个月回籍葬亲，假满后又来京应役。在造办处供役时间较长，至少有17年之久，制作玉器较多，如白玉东方朔献寿陈设、白玉东升、玉鹅、青玉桃式水盛、鸡心珏、白玉双鹿等。

张君选在宫廷的际遇也值得关注。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因做白玉蟠夔洗迟滞不合样款，受到将所食每月钱粮减去一两的处罚。更令人不解的是，乾隆四十年九月，不知什么原因，张君选突然私自逃回苏州老家，

1 《总汇》第26册，第649页，乾隆二十六年正月《行文》。

2 《总汇》第26册，第709页，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如意馆》。

3 《总汇》第27册，第372页，乾隆二十七年七月《记事录》。

4 《总汇》第30册，第119页，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如意馆》。

5 《总汇》第38册，第729页，乾隆四十年闰十月《记事录》。

6 《总汇》第39册，第217页，乾隆四十一年五月《金玉作》。

7 《总汇》第40册，第709页，乾隆四十二年二月《金玉作》。

不久即被拿获，遣送回京。当时的内务府大臣福隆安为此上奏乾隆：“臣福隆安查，前月二十三日苏州织造舒文具奏，接准造办处行文，查拿私自逃回之玉匠张君选，现已押解送京一折，经奏事处传旨：俟该犯解到时报奏，钦此。今逃匠张君选，于本月初五日据舒文差人将该犯解交内务府理合奏闻。臣福隆安即一面审讯，另行具奏。谨奏。”¹ 根据福隆安的上述奏折，张君选逃走后，造办处即行文苏州织造查拿，因此张君选刚一到家，即被拿获，并派专人押解回京，于闰十月初五日将张君选解交给内务府，整个事件持续两个多月。我们也注意到，张君选被押解回京的十天之后，乾隆帝即吩咐相关人员为张君选安排活计。可能是张君选的手艺深得乾隆帝认可，因此即便是他私逃回籍，在查明原委后，仍然将他留在造办处继续当差。这和后面提到的可能一起逃走的苏州刻字玉匠朱时云正好形成对比。

11. 贾文远

玉匠。具体来京日期不详。活计档最早的记载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当时贾文远因患病，引起乾隆帝关注，于十一月“初二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赏给玉匠贾文远每月半分钱粮，仍着医治。”² 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告假回籍葬父养母，“造办处谨奏为玉匠贾文远告假回籍葬父养母，请照例准其回籍，仍着该织造另选好手玉匠一名，送京应役等因，缮折持进交太监胡世杰转奏，奉旨：知道了，钦此。”³ 从档案行文分析，贾文远自此回到苏州奉养老母，不再回京应役，因此，苏州织造另选好手玉匠顶补。他在造办处服务至少达8年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三十六年的活计档仍然记录下了身在苏州的贾文远和宫廷造办处的进一步关系，这年五月“二十三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十四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将未做完碧玉壶、盘呈览，钦此。于本日将碧玉壶一件、碧玉盘一件随纸样二张，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著交苏州织造舒文处雇贾文远成做，其年款照原粘处刻，钦此。于三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将苏州送到碧玉杯、盘、壶一份，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⁴ 看来，乾隆帝对其手艺可能非常满意，即使是他回到苏州奉养母亲，乾隆帝对其仍念念不忘，特别指示苏州织造舒文将发往苏州制作的碧玉壶、碧玉盘“雇贾文远成做”。当然，此时贾文远的身份已经发生变化，由内廷玉工而为外雇玉匠。

12. 朱时云

刻字玉匠。具体来京日期和应艺情况不详，在如意馆行走，每月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

关于朱时云的情况，我们只知道他在乾隆四十年（1775）九月私行潜逃回南，而且极有可能是和另一位苏州玉匠张君选一起逃走的，因此命苏州织造将其拿解来京治罪。造办处为此具奏：“查本年九月内如意馆行走刻字玉匠朱时云因病告假，私行潜逃。经造办处奏明行文苏州织造将朱时云拿解来京治罪。并另选好手刻字玉匠速送来京应役等因，奏准在案。”⁵ 朱时云受到相应处罚后，被退回原籍。苏州织造另行挑选刻字玉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八册，第53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感谢同事滕德永副研究员为我检出此条材料，使我注意到张君选出走的时间和另一位苏州刻字玉匠朱时云的出走时间极为接近，并进而推断二人的私逃回籍极有可能是现知不多的苏州玉工集体出走事件。这对认识宫廷中的苏州玉工的群体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2 《总汇》第28册，第78页，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意馆》。

3 《总汇》第33册，第482页，乾隆三十五年十月《记事录》。

4 《总汇》第34册，第250页，乾隆三十六年五月《行文》。

5 《总汇》第38册，第729页，乾隆四十年闰十月《记事录》。

匠朱永瑞来京顶补当差，造办处因此奏请将朱时云“所佩带腰牌一面，今更名刻字匠朱永瑞”¹ 在所有的服务于宫廷的苏州玉匠中，朱时云显得相当特别，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内廷工匠私自潜逃的案例。档案说他是因病告假，这在内廷工匠中是很普遍的现象，乾隆帝和造办处的管理者一般都会准其休假，甚至有时还会发给一定的钱粮以使其调养身体。朱时云肯定也通报过他的病情，完全可以正当休假养病，但为什么又私自逃跑回籍，实令人费解。将其退回原籍，可能也与他因病告假有关。从时间上来看，朱时云极有可能是和同是苏州籍的玉匠张君选一起出走的。这种玉匠的结伙出走也暴露出当时造办处工匠管理的一些疏漏。

13. 朱永瑞

刻字玉匠。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由苏州织造选送来京，以顶替朱时云之缺。

“造办处谨奏：查本年九月内如意馆行走刻字玉匠朱时云因病告假，私行潜逃。经造办处奏明，行文苏州织造将朱时云拿解来京治罪。并另选好手刻字玉匠速送来京应役等因，奏准在案。今据舒文选得刻字玉匠朱永瑞一名送赴来京，奴才等随试看得朱永瑞，镌刻玉字手艺尚好，堪以应役，理合奏明，令伊如意馆当差外，查朱时云每月原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今新送到刻字玉匠朱永瑞一名，应否赏给钱粮衣服银两之处，伏候谕旨遵行等因，缮折交太监胡世杰具奏，奉旨：准其如意馆当差，其钱粮衣服银照例赏给，钦此。”²

又：“刻字匠朱时云因潜逃回南不报，奏准将朱时云治罪，其伊所佩带腰牌一面，今更名刻字匠朱永瑞，年二十九岁，已备出入门禁佩带。相应行文都虞司照例办理外，本处仍知会内务府、景运门查照外可也。”³

又：“接得郎中保成押帖内开本日太监鄂勒里传旨：刻字活计拿来看，钦此。随将刻字活计交太监鄂勒里转呈览奉旨：朱永瑞、庄秀林刻做活计为何不见，随经太监鄂勒里口奏：朱永瑞现患吐血劳症，庄秀林现患眼疾，伊等不能做活，将朱永瑞、庄秀林二人钱粮于十月份业经停止等因声明，奉旨：该停止伊等钱粮，既不能做活，将朱永瑞、庄秀林退出，听其自便。告诉全得拣选好手刻字匠送一名来，钦此。”⁴

可知朱永瑞来京后，经试看手艺，准在如意馆行走。因经常出入宫廷，造办处特申报将朱时云原来的出入腰牌给朱永瑞，来京时二十九岁。三年以后，因患吐血劳症，被退出宫廷，自己谋生。其在造办处应艺三年，每月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

14. 陈始健

玉匠。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由苏州织造挑补送京，以顶补先前被退回的玉匠四儿之缺。造办处档案中只有两条来京之初为其申请更换腰牌的记录：

“养心殿造办处为更换匠役腰牌事。今本处如意馆刻字玉匠朱时云、玉匠四儿退回。今挑补得玉匠陈始健年二十七岁，刻字玉匠朱永瑞年二十九岁顶补当差，除呈报内务府、景运门查照外，相应行文都虞司照例将陈始健、朱永瑞腰牌、花名、年岁更换可也。”⁵

1 《总汇》第39册，第112页，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各处行文》。

2 《总汇》第38册，第729页，乾隆四十年闰十月《记事录》。

3 《总汇》第39册，第112页，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各处行文》。

4 《总汇》第41册，第830页，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如意馆》。

5 《总汇》第39册，第108页，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各处行文》。

“养心殿造办处为行匠役腰牌并更名事。今本处苏州新送到玉匠陈始健一名年二十七岁，奏明在如意馆行走，出入门禁并无腰牌，相应呈明批准，交该处添给腰牌一面等因呈准……。相应行文都虞司照例办理外，本处仍知会内务府、景运门查照外可也。”¹

陈始健来京时二十七岁，经奏明在如意馆行走。

15. 张德绍

玉匠。具体来京日期不详，在如意馆行走。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二十五日，造办处谨奏为请旨事：查如意馆玉匠张德绍因伊父年老，告退回籍终养，前经奏准，仍着该织造舒文另选好手玉匠一名送京顶补当差……。查张德绍每月原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²知其由苏州织造选送来京，因其父年老，告退回籍终养。在造办处每月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

16. 蒋均德

玉匠。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由苏州织造选送至京，顶补玉匠张德绍之缺。

“造办处谨奏为请旨事：查如意馆玉匠张德绍因伊父年老，告退回籍终养，前经奏准，仍着该织造舒文另选好手玉匠一名送京顶补当差，今据舒文选得玉匠蒋均德一名送赴来京，奴才等随试看得蒋均德玉活计手艺尚好，堪以应役，理合奏明，令伊如意馆当差，查张德绍每月原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今新送到玉匠蒋均德应否依张德绍赏给钱粮衣服银两之处，伏候谕旨遵行。缮折交太監如意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³

经造办处试看手艺后，令在如意馆当差，每月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

17. 平七

镗玉匠。嘉兴人，为教授镗玉技术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由苏州织造选送来京，教授宫内镗玉匠镗玉器里堂及外身等技术。在宫廷服务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但对宫廷玉器制作技术的影响相当深远。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玉石走私案被揭发，与他合伙贩玉的山西商人张鸾在苏州雇佣玉匠制作的九十余件玉器也被收缴送往北京，其中就包括由在苏州开有玉器店的平七和平八兄弟二人为其镗做的玉器。当乾隆帝看到这些玉器时，发现其中的玉盘采用成套镗制的制作方法很特别，与传统的加工工艺完全不同，禁不住赞叹“其法甚巧”。于是就有了第二天的一道上谕：“昨据杨魁处解送张鸾家玉器、玉料到京呈览。内有玉盘系整套镗成者，其法甚巧。询之在京所有玉匠，皆云不能。据称苏城只有平七、平八二人专门做此，其法不肯传人，等语。此等玉匠，虽有不传之秘，但既系工作图利，在苏在京大概相仿。且知奉朕旨选送，自更欣然乐从。著传谕舒文，即于此二人内挑选一人，妥为资送来京，其应用做玉器具，并令其检齐随带，勿任其托故推避。将此随杨魁之报发往，并谕令全德知之，钦此。”⁴

根据乾隆的旨意，苏州织造全德即着手办理，并将情况专折奏报乾隆帝：“奴才当即面询舒文，据称传

¹ 《总汇》第39册，第112页，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各处行文》。

² 《总汇》第40册，第430页，乾隆四十二年五月《记事录》。

³ 《总汇》第40册，第430页，乾隆四十二年五月《记事录》。

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九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451页。

询平八，原籍嘉兴县人。平七系伊胞兄，素工玉匠手艺。平八在苏州开张玉器店，平七现在嘉兴原籍。其张鸾之整套镗成玉器系伊胞弟兄揽做。当经告以奉旨选送之语，平八欣然乐从。现在差人往嘉兴传唤平七，俟其到来，于此二人内挑选一人，令其带齐做玉器具，即日专遣家人妥为资送进京，不致任其推避迟误等语。奴才随即传询平八，口称手艺小民，得以进京当差，甚是体面，实在欢欣情愿。除俟平七到来，即行挑选，妥为资送外，理合先行奏闻。谨奏。”¹于是，平七被选中北上宫廷，于四十四年正月到达造办处。乾隆皇帝即命“沈耀祥、李均章并家内小匠役俱着学镗做活计”²。

平七在如意馆的镗玉技术培训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乾隆皇帝对培训的进展也给予充分关注。到九月二十七日太监鄂勒里再传乾隆谕旨：“启祥宫学镗玉匠已会，着平七回南。”经过造办处官员郎中保成和库掌福庆的调查了解，认为培训还有未完之项，平七还不能离开，于是便上奏乾隆：“镗玉匠等现在虽会镗里堂，其外身做法尺寸尚未熟练，请旨将平七再留数月，俟学镗玉匠等学会外身做法时再令伊回籍”，乾隆帝同意“明春再着平七回籍”。³最后，平七于春节前回籍。平七虽然在宫廷服务只有一年，但将镗玉技术传播到了宫廷，丰富了清代宫廷的玉器制作技术，使得以后宫中的镗玉技术一直承续着平七的技术传统。关于平七在宫廷传授镗玉技术的详细情况，参见笔者《平七与镗玉技术在宫廷的传播》一文。⁴

18. 朱云章

镗玉匠。为教授镗玉技术于乾隆四十四（1779）年正月由苏州织造选送来京，和平七一起教授宫内镗玉匠镗玉器里堂及外身等技术。

关于朱云章在宫廷中的情况，档案记录很少，所知只有两条：一是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初八日，接得郎中保成押帖一件，内开，正月初十日，额鲁里传旨：新到镗玉匠平七、朱云章二人现镗做一件活计，着分为二处，各镗做活计一件，打砂子配家匠帮做。再沈耀祥、李均章并家内小匠役俱着学镗做活计。钦此。”⁵二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接得郎中保成押帖，内开：初四日，太监厄勒里传旨：镗玉匠平七、朱云章，俟启祥宫放年假时，不必进启祥宫，加恩着伊回籍。钦此。”⁶可知他和平七一样，只在宫中服务一年，是将镗玉技术传入宫廷的重要人物之一。

19. 朱佐章、朱仁方

玉匠。在玉器烧补颜色方面具有专长，故乾隆四十四年（1779）被苏州织造选送到京为新做好的大玉瓮烧补颜色。

乾隆四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管理养心殿造办处事务舒 将现做未完大玉瓮一件安在启祥门呈览，并将玉瓮上柳道过多必需烧补颜色方为整齐，但遍觅京内，竟无能补各样颜色，可否着全德送京之处，交太监厄勒里口奏，奉旨：准交苏州织造全德将玉匠朱佐章作速送京烧补玉瓮颜色，完时即令伊回南，钦此。于

1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全德《奏报遵旨挑选玉器艺匠平七平八二人解送张鸾家玉器玉料到京呈览》折，《军机处档奏折录副》，022006号，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2 《总汇》第42册，第666页，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如意馆》。

3 《总汇》第42册，第711页，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如意馆》。

4 郭福祥：《平七与镗玉技术在宫廷的传播》，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3期。

5 《总汇》第42册，第666页，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如意馆》。

6 《总汇》第42册，第590页，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记事录》。

十一月二十三日奴才舒文谨奏，为奏闻事：今据苏州织造全德来文之内称：遵奉传换玉匠朱佐章，令其即日进京。据补大件玉器，必须帮办之人。匠子朱仁方素带帮做有年，系是熟手，恳携带进京帮做等因，今差人将朱佐章并子朱仁方俱已伴送到京，理合声明，令其烧补玉瓮颜色，俟完时即令伊等回南，为此谨奏，于本月二十三日交太监厄勒里具奏，奉旨：知道了，即令伊烧做玉瓮颜色，赶何日可得，并将新做玉瓮照乾清宫现安玉瓮紫檀木包镶石心木座一样配座……。于本日经管理养心殿造办处事务舒文、太监鄂鲁里口奏：问得朱佐章，此项玉瓮活计甚大，不能预为料估，定准得日期，奴才现派官员达他昼夜监看，赶紧烧补，务限伊于年内赶完……。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将大玉瓮一件，着朱佐章带领伊子烧补得颜色，安在启祥门内呈览，并请示朱佐章与伊子朱仁方可否令其回籍，或留京当差之处，交太监厄勒里口奏，奉旨：朱佐章并伊子俱着回籍，其玉瓮里塘刻诗。”¹

从档案的记述来看，乾隆皇帝似乎对朱佐章很熟悉，因此钦点他到京应艺。这也是典型的宫廷征召具有特种技艺的苏州玉工的例子，这种情况一般是针对特殊需求，专事专办，完成后即回籍。朱佐章、朱仁方父子到造办处后，昼夜施工，只用一个月时间即完成了施工任务。这也是笔者所知乾隆时期苏州玉工在宫廷服务时间最短的例子。

20. 林永年、姚肇基、顾位西

刻字玉匠。乾隆四十六年（1781）为重镌太庙尊藏册宝，三人与其他十五位刻字玉匠一起由苏州织造分次选送来京，在如意馆镌刻册宝。乾隆四十七年镌刻册宝完成后，其中林永年回籍，姚肇基、顾位西则被留在如意馆应艺。

对太庙所藏本朝诸帝后谥册、谥宝按照统一规制重新改做镌刻，是乾隆后期宫廷玉器制作的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也是乾隆皇帝对宫廷典章玉器进行规范化的重要举措，宫廷玉作系统之内的各个制作机构几乎全部被卷入这一工程中来。

该工程始于乾隆四十四年，这一年的“六月二十四日，钦奉谕旨：太庙现在尊藏册宝应镌造一律，以彰符命。”²随着新疆叶尔羌玉料大量运送到京，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开始，苏州织造、两淮盐政、长芦盐政等纷纷承制规格统一的成份玉册、玉宝，并陆续交付。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七日，造办处负责玉册宝镌刻的官员英廉、福隆安奏请：“查如意馆现有刻字玉匠四人，细询该处官员，据称此内惟二人可以镌刻册宝，且各有在手活计。如令此二人承办，势必过去迟滞。奴才等伏思：新制册宝奉为永远尊藏，字画款式必须镌工整，惟精练玉工方能胜任。若即在京募选匠人，恐刻手草率，不能合式。倘将册宝送交苏州织造遴匠镌刻，似较迅速，但刻成之后，若照寻常交办事件赍送来京，殊于体制未协。相应请旨，敕下苏州织造全德，在苏州玉工内精选好手八人，即速送京，令其敬谨承办，俟镌刻全竣后仍令回苏。庶镌造不致需时，而办理亦昭慎重。是否有当，伏祈皇上睿鉴训示。谨奏。”³获得乾隆帝批准。

¹ 《总汇》第39册，第551～553页，乾隆四十一年《大玉瓮》。

² 《总汇》第43册，第236页，乾隆四十四年十月《题头旨意档》。

³ 《总汇》第43册，第237页，乾隆四十四年十月《题头旨意档》。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初五日，奉旨：着问苏州刻字匠役送来无有，钦此。随答应：刻字匠役业已到来，中堂英廉、公尚书福隆安现在办理等语。交太监鄂鲁里口奏，奉旨：着传与英廉、福隆安急速办理，着镌刻。”¹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掌稿笔帖式和宁持来奏片一件，奴才英廉、福隆安谨奏为请旨事：奴才等遵奉太庙玉册宝十六分业经节次奏明，令派出官员率领苏州送到玉匠八名将册宝本文十六分随得随刻，敬谨监视赶办。查如意馆现今刻玉字匠朱鸣岐等每月各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今苏州新送到刻字匠役八名，非长在京内当差者可比，除每季衣服银两无庸给与外，应否照朱鸣岐等每月赏食钱粮银三两之处，奴才等未敢擅便，伏候训示。再查如意馆向例镌刻玉字所用金刚钻，系奏请由内赏用。本年由玉匠朱鸣岐等四名成做玉活，经该处奏明公赏用过金钻二分七厘，按玉匠四名核算，每名分给金钻六厘七毫。今苏州新到玉匠林永年等八名，现在镌刻册宝，请照如意馆玉匠之例，每名赏给金刚钻六厘七毫。玉匠八名合计金刚钻五分四厘，请由内领取应用。”²

同日，英廉、福隆安又奏报：“今苏州送到玉匠八名内，能镌宝玉匠二名，能刻字玉匠六名。今查，玉匠二名镌宝十六方，按日核算，计二年方可镌完。其刻字玉匠六名刻玉册十六份，按日核算，计至二十个月方能刻完。似为日甚多，恐至迟误。应请行令苏州织造即选派镌宝及刻字玉匠八名送京，以期赶紧妥协镌刻，约计一年即可完竣。理合请旨遵行，为此谨奏请旨。”³再获批准。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堂英廉、公尚书福隆安将刻得《太祖高皇帝玉册》一分、《孝慈高皇后玉册》一分，持进交太监鄂鲁里呈览，奉旨：所刻玉册俱满填金字，随得随填，钦此。”⁴

又“片奏为请旨事：奴才等遵奉谕旨恭办镌刻太庙玉册宝十六分，前因苏州送到玉匠八（以下原档缺），经奏明行令苏州织造全德另拣好手玉（原缺）京帮同赶办。今据苏州织造全德选派得玉匠（原缺）咨送前来，奴才等即令随同现在之玉匠等一同分办活计。查前次玉匠八名，曾经奏准照如意馆玉匠之例，每月得给钱粮银三两，今新送到玉匠八名，相应奏明，请照前次玉匠之例，每月亦各赏给钱粮银三两。为此谨奏请（原缺）等因缮折，于十月十三日随午活具（以下原缺）。”⁵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接得库掌福庆持来折片一件，内开：谨奏为奏闻事。遵旨镌刻磬料、玉册宝十六分，前经奴才等奏明，交苏州织造选送刻字玉匠八名、镌宝玉匠八名送京刻做。原奏限一年镌刻完竣。今旦上年六月二十二日起至本年六月一年期内，已将玉册玉宝敬谨镌刻完竣，其字文俱行填金，现在造办处库敬贮，俟圣驾回銮时，奴才等预备恭呈御览，再行遵旨办理。查本年二月十二日奉旨：现办玉册南来刻字玉匠八名，俟刻字工竣，俱着进如意馆，将现存未刻做活计，着分刻，得时在此刻字玉匠八名内拣选好手二、三名，留如意馆行走，其余即令伊等回南。钦此。钦遵。今玉册、玉宝既已恭刻完竣，所有刻字玉匠八名，理合遵旨令其进如意馆，将未完之玉活分刻赶做，完竣时看其手艺好者，拣选二、三名留京当差。其镌宝玉匠八名，即先交四德坐京家人带回苏州。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四日交太监鄂鲁里转奏，

1 《总汇》第43册，第240页，乾隆四十四年十月《题头旨意档》。

2 《总汇》第43册，第241页，乾隆四十四年十月《题头旨意档》。

3 《总汇》第43册，第241～242页，乾隆四十四年十月《题头旨意档》。

4 《总汇》第43册，第243页，乾隆四十四年十月《题头旨意档》。

5 《总汇》第43册，第245页，乾隆四十四年十月《题头旨意档》。

奉旨：知道了，钦此。”¹

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接得郎中保成等押帖内开：九月二十二日新来刻玉字匠刻得旧存玉活，随名单呈览。奉旨：姚肇基、顾位西留如意馆，余准回南，钦此。”²

上引档案完整地再现了重制太庙谥册、谥宝的过程，可知整个工程从动议到完成历时三年，期间造办处从苏州拣选了两批共十六位镌宝玉工和刻字玉工到京，专门办理此项活计。林永年、姚肇基、顾位西是其中确切知道姓名的三位，由于是临时调用，他们的待遇相对较低，无安家银和衣服银，只是每月给钱粮银三两。林永年应艺时间自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至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共一年有余。姚肇基和顾位西则于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或十月来京，具体服务年限不详。

21. 朱鸣岐

刻字玉匠，具体入京时间不详。

前引活计档表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英廉、福隆安请旨，苏州送到镌刻册宝玉匠八名是否比照朱鸣岐等每月钱粮银发给。这种情况多是来自同地同工种的工匠作为参照，故此推断其亦为苏州织造选送。

“查如意馆现今刻玉字匠朱鸣岐等每月各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今苏州新送到刻字匠役八名，非长在京内当差者可比，除每季衣服银两无庸给与外，应否照朱鸣岐等每月赏食钱粮银三两之处，奴才等未敢擅便，伏候训示。再查如意馆向例镌刻玉字所用金刚钻，系奏请由内赏用。本年由玉匠朱鸣岐等四名成做玉活，经该处奏明公赏用过金钻二分七厘，按玉匠四名核算，每名分给金钻六厘七毫。今苏州新到玉匠林永年等八名，现在镌刻册宝，请照如意馆玉匠之例，每名赏给金刚钻六厘七毫。”³

可知朱鸣岐每月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

22. 王振伦

玉匠。乾隆四十九年（1784）由苏州织造选送到京，经试看手艺后在如意馆应艺。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太监鄂鲁里交：青玉虎一件，系苏州新送到玉匠王振伦试手成做。传旨：带进京交造办处入百什件，钦此。”⁴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三日，接得郎中保成押帖内开：二月初九日太监鄂鲁里交：水石子一块、水石料一块，传旨：交如意馆着沈瑞龙认看画样，钦此。于本日将石子一块画得牛一件墨道、水石料一块画得宝一方墨道，交鄂鲁里呈览奉旨：将做牛石子侧开看，宝照样做，钦此。于初十日将石子一块侧开一块画牛一件、一块画虎一件，呈览奉旨：牛着王振伦做，虎着沈瑞龙做，钦此。”⁵

看来，王振伦擅长制作圆雕动物，试手作品即被乾隆皇帝收入多宝盒百什件中，曾经制作过青玉虎、子玉牛等。

¹ 《总汇》第43册，第246～247页，乾隆四十四年十月《题头旨意档》。

² 《总汇》第45册，第406页，乾隆四十七年九月《行文》。

³ 《总汇》第43册，第241页，乾隆四十四年十月《题头旨意档》。

⁴ 《总汇》第47册，第490页，乾隆四十九年《热河随围》。

⁵ 《总汇》第50册，第173页，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如意馆》。

23. 顾继臣、顾耀宗

顾继臣、顾耀宗父子为来自苏州的砚匠，但也参与玉器相关之事，故亦将其二人列入。

雍正九年（1731）五月十九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奏称：“再有做砚台、做牙活南匠施天章、顾继臣、叶鼎新等几人俱在圆明园长住，做活甚勤等语”奏闻雍正帝，雍正帝回复：“尔酌量按等次赏给。”于是就在同一天，海望定得赏赐的匠役花名及银两数目，按数将银两发放给工匠。其中顾继臣被赏赐银十两。¹

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十六日，首领李久明来说：奏事太监王常贵等交玉石大小四块，传旨：着认看，钦此。于本月十八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顾继臣、玉匠雷永舒同认看得翡翠石一块、葱白玉一块、西碧玉一块、南碧玉一块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葱白玉交安宁、图拉做爵盘二分，先做样呈览，准时再发去。其翡翠石并西碧玉一块、南碧玉一块交造办处有用处用，钦此。”²

乾隆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青绿驼洗一件，随紫檀木座木盖样，传旨：着交苏州织造安宁、图拉令顾继臣照木盖样用好端石做砚一方，阴刻文字，做旧，着伊子顾耀宗亦学着做旧，到京时好做旧砚。钦此。”³

顾继臣从雍正年间即在宫中造办处服务，由于手艺精湛，承应勤慎，曾受到雍正皇帝白银十两的赏赐。进入乾隆朝以后，曾认看玉石，制作端砚。乾隆十一年顾继臣似乎已经离开造办处，回到苏州，他在造办处应艺至少15年以上。他回到苏州以后，乾隆皇帝仍然让苏州织造雇他制作活计，同时令其子顾耀宗亦学着做旧，以便将来到京时制作。说明其子顾耀宗极有可能也被招募到造办处，接替他的工作。根据乾隆六年的发用银两档，顾继臣每月的钱粮银为十两、每季衣服银九两，是相当高的待遇了。

三 造办处苏州玉工的群体状况及其管理

以上是根据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整理出的乾隆时期服务于宫廷造办处的苏州玉工的大致情况，可以考见姓名者多达27位，远远超出以往的研究。将他们在宫廷造办处的活动综合起来考察，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苏州玉工和乾隆宫廷玉器制作高度繁荣间的密切关系。⁴ 前述大量苏州玉工在宫廷活动的档案，极大地丰富了原本缺乏的中国古代工匠尤其是玉器工匠的史料，这里仅就造办处苏州玉工这一群体的总体情况作一基本归纳。

首先，乾隆时期选送到宫廷的苏州玉工可以分为长差和临时应艺两种情况，二者之间在服务期限、待遇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

长差是为了满足宫廷玉器大规模制作的需要，专门拣选好手玉匠到造办处服务。这些玉匠长期在造办处行走，除非遇有父母去世，家人需要奉养等情况，经过申请，批准后可以回籍，其在宫廷服务的时间少则

¹ 《总汇》第5册，第49页，雍正九年五月《记事录》。

² 《总汇》第12册，第314页，乾隆八年十二月《记事录》。

³ 《总汇》第13册，第719页，乾隆十年十一月《苏州》。

⁴ 参见郭福祥：《宫廷与苏州——乾隆宫廷里的苏州玉工》。

几年，多则二三十年。前述诸多刻字匠和雕玉匠就是如此；临时应艺则是由于宫廷玉器制作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需求，临时抽调玉工进京。相应工程完成后即回籍，服务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前述平七、朱云章传授铤玉技术和朱佐章、朱仁方父子为大玉瓮烧补颜色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代表。

长差和临时应艺在待遇方面也是有区别的。长差玉工的待遇相对较为优厚，在宫廷服务期间，由苏州织造给安家银两、衣服银和养家口银，由造办处每季给衣服银、按月给钱粮银。苏州织造付给的安家银和养家口银，内务府档案提供了相关信息。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员外郎四德、五德、催长大达色、副催长福来说，太监鄂鲁里传旨：着问舒文，向例苏州给画画人并南匠安家银两若干之数回奏，钦此。于十二月初一日管理养心殿造办处事务舒文遵旨查得，向例奉文传要画画人并南匠，织造处每名给安家银五十两，另外给做衣服银五十两，仍案月给与每名养家口银二两，缮写折片持进交太监鄂鲁里呈览，奉旨：知道了，钦此。”¹ 这些南匠当然也包括苏州玉工在内。至于造办处给付的钱粮，除了少数较多外，绝大部分都是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每月钱粮银三两。如此，长差玉工一般每年的收入都在百两以上，应该比较高的待遇了；而临时应艺的苏州工匠由于服务的时间都不长，苏州方面不太可能给付安家银和衣服银，造办处也只是按月支付钱粮银，一个月只有几两银钱，远远不及长差。但他们对于宫廷玉器的繁荣的贡献却是不容小觑的。

其次，乾隆时期选送到宫廷的苏州玉工是有着相当明确的分工的。

乾隆时期之所以成为中国玉器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表征即是专业分工的细密化，这一点在宫廷玉器的制作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前述 27 位苏州玉工中，都可以考见其在宫廷玉器制作中的具体分工，其中雕刻玉匠 15 名、刻字玉匠 10 名、铤玉匠 2 名，这样的人员分工结构恰恰反映出乾隆时期宫廷玉器制作的深刻变化。

在乾隆以前，中国玉器雕刻的主要着眼点在于造型和纹饰，玉器上的铭文是极为有限的，且铭文雕刻技法比较单一，文字形态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从整体上来看，玉器雕刻艺术一直是一种以造型为主的艺术门类。这种情况到乾隆时期出现了重大转变。乾隆皇帝对玉器的社会功能极为看重，将其视为反映社会思想意识的重要载体，因此乾隆时期的玉器呈现出极为丰富的面向，承载起了当时社会丰厚的历史意蕴。而其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这一时期的玉器制作造型和文字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字越来越成为玉器表现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乾隆皇帝的御制文和御制诗大量被雕刻在玉器之上。与这一现象相对应，宫廷玉器制作和雕刻业出现了刻字玉匠，专门从事玉器铭文的雕刻，而且刻字玉匠在整个玉匠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工作甚至与雕刻玉匠并驾齐驱，等量齐观。乾隆时期玉器上的文字雕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刻字玉匠从玉器雕刻工匠中分离出来，也成为乾隆玉器区别于其他时代玉器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前述苏州玉工雕刻与刻字的分工情况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体现。

再次，宫廷对苏州玉工的管理上充分兼顾宫廷需求和个人实际，灵活机动，且指令多出于皇帝睿裁。

我们注意到，向苏州织造征选玉工的指令多是由皇帝发出的，表明乾隆皇帝对宫中苏州玉工的整体情况了如指掌。苏州玉工从地方到京城、从造办处试看到具体职事的安排，都在皇帝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皇

¹ 《总汇》第 42 册，第 583 页，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记事录》。

帝是参与了苏州玉工的管理工作的,具体过程中管理者对宫廷和个人的充分兼顾,显示出其管理灵活的一面。

以苏州玉工告假回籍为例,乾隆二十八年苏州玉匠徐明彩因母丧告假回籍葬亲,乾隆皇帝觉得以亲老不能久离者到京工作,致使相关部门往返稽查,实在麻烦,不如干脆选择无家累牵制者送京。针对乾隆皇帝这一比较极端的想法,时任苏州织造,具体负责苏州玉匠拣选的萨哈岱根据实际情况,奏覆如下:“至此后挑选工匠,谨当钦遵谕旨,务择手艺精工而无家累牵制者选送,断不敢止图充数,草率塞责。但奴才窃有请者,凡送京之工匠自以手艺精工为要,第其中或手艺精工而不能无家累,或有竟无家累而手艺又不能精工,一时选送恐难合式。且百工技艺惟贵精专,彼到京未久辄思籍词告假之工匠,揆其初愿,不过图得送京时之衣装盘费起见。所以一经到京,延挨数月即思诬假回籍,如此居心,则其在工岂能实力工作?奴才愚昧之见,请嗣后选择工匠,其有艺精而无家累者,自应遵旨选送。倘一时不能得人,除亲老丁单外,其余总以手艺精工者选送到京之后,俟造办处再行试看。若果技艺精巧,即询问该匠,如愿搬移家口至京,即行知会奴才衙门,酌给衣装盘费,将该匠家口送至京中居住,以释其内顾之忧,俾得专心致志竭力工作。如有安土重迁不愿搬移者,亦须立定年限,在京供艺五年之后,方许其告假。如在五年限内,非患病属实,必须回籍调理者,不许在京告假。其原籍如遇必不得以事故,许该家属赴奴才衙门具呈,俟查明确实,移咨造办处,方准给假,仍勒限回京。如此明定章程,其愿移者既属一劳永逸,即不愿移者,亦不得籍词告假。庶可杜其迁延规避之念,方与工作有益。至粤东去京遥远,搬移家口势所难行,其告假回籍,事同一例,应否亦如是办理,合并陈明,伏乞圣明训示。谨奏。”¹乾隆帝在萨哈岱的奏折上朱批“知道了”三字,并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想法,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可以推测萨哈岱的此一提议应该得到了实施。萨哈岱的奏覆针对的是所有南匠的管理,当然也就包括苏州玉工的管理。如此我们对造办处苏州玉工的管理机制大致有如下的了解:对于亲老丁单的玉工不再征选。被征选的玉工如果本人同意,可以由苏州织造负责将家口送至京中居住,以便于其安心工作。对于不愿迁移家口的玉工,除非身患疾病或家中有不得已的事情,五年之内不得告假回籍。上述措施保证了宫廷玉器制作队伍的稳定和效率。

但这样的管理模式也不是没有问题。尽管管理层对南匠的家庭状况和待遇给予了充分的考虑,但由于南北方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远离家乡的南匠们仍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不适。他们在宫廷中一呆就是几年,其活动圈子是很小的,接触的人员也相当有限,主要是同行和同乡。这种情况往往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密切,互通信息,共同的感受产生共同的行动。由于偶然的因素,很可能使他们结伴行动,前面讲到的张君选和朱时云一起私自潜逃回籍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南匠出走的原因似乎和经济利益关系不大,主要是与各自的身体疾病和家庭变故有关,更和思念家乡的情结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对出走工匠的处罚也显得相当人性化。张君选很快又继续他的玉器活计制作,朱时云被遣送回籍,都显示出宫廷工匠管理的变通和灵活性。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技艺精湛的苏州玉工一旦被征选,也就和宫廷玉器制作结下了无法割断的联系。即使是他们因各种原因离开宫廷,回到原籍,这种联系或多或少都会对玉工本身及其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¹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萨哈岱“谨奏为查明徐明彩母丧告假并奏覆事折”,《宫中档奏折》,403016221号,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

在前述 27 位苏州玉工中，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在宫廷服务的时间都比较长，而回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葬亲和奉养父母。作为手艺之人，他们回籍之后最大的可能仍然凭借其精湛的手艺制作玉器，维持生计，那么宫廷应艺的经历对他们的身价而言就显得相当重要。而对于掌握有独门绝艺者如镗玉匠平七而言，情形则另当别论。有的玉工回到苏州后，仍然被苏州织造雇佣继续为宫廷制作玉器，比如贾文远和鲍德文就是如此。这些回到苏州的宫廷玉工，无疑会对苏州当地玉器制作，尤其是苏州和宫廷之间的互动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四 结 语

历史的机遇使这些苏州玉工登上了宫廷这个舞台，在这里苏州玉工精湛的制玉技术和宫廷独特的审美意趣有机结合，成就了乾隆时期宫廷玉器的繁荣局面。一方面，苏州玉工是一个人才济济的群体，他们大多来自于文化积淀深厚，技术传统悠久的江南各地，掌握着许多玉器制作方面的特别技术，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但影响辐射全国的态势，因此，清代宫廷尤其是乾隆宫廷内的南匠玉工基本上都是由苏州织造从江南地区挑选。这些玉工不但将精湛成熟的苏州制玉技术带到宫廷，而且还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满足宫廷融合各种技术并有所创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宫廷也为这些玉工施展才艺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充足的材料供应，不惜工本只求完美的质量管理机制，包括皇帝、画师、玉工在内的强大设计团队，所有这一切都使这些苏州玉工得以摆脱传统家庭式手工作坊的种种限制，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创作之中。宫廷成为南北玉器制作技术和理念融通交汇的舞台，苏州玉工的北上，形成了和宫廷间的良好互动，极大影响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玉器制作，使得元明以来形成的南北玉器精细与粗犷的风格分野变得渐趋一致，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工艺品实物是极为丰富的，但对它们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实物本体观察、时代断定以及风格分析。由于正史和官书对工匠记载的缺失，使得中国古代工艺和技术研究面临着史料缺乏的困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工艺实物遗存的丰富和工匠记录的缺乏形成鲜明反差，二者之间很难对接起来，使得工艺研究往往只见物而不见人。清宫造办处活计档却一反传统史料的窠臼，提供了宫廷工艺品制作过程的丰富资讯，为还原古代工艺技术变革和制作细节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就玉器制作而言，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像乾隆时期那样，将玉器实物和人的社会网络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些造办处苏州玉工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无疑会对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宫廷部]

